

記憶之城・虛構之城——《灤京雜詠》 中的上京空間書寫*

李嘉瑜**

〔摘要〕

上京書寫是元詩中最重要的主題之一，《灤京雜詠》被稱為元代最後的上京紀行詩，但其書寫方式卻非常見的現地紀行，而是在旅行結束後的許多年，作者楊允孚聽聞上京城已徹底壞毀於戰火，於是在回憶中重構那座已經永遠消逝的草原都城。

本文將以文化地理學做為主要參考架構，探析作為文學文本的《灤京雜詠》究竟用什麼方式來重構上京？而通過「回憶」這種特殊的觀看視角，《灤京雜詠》所再現的上京，又會與其他元代詩人所書寫的上京，有什麼差異呢？希冀藉由此一討論，深化目前上京紀行詩研究的層面與論述。

關鍵詞：元詩、上京紀行詩、灤京雜詠、空間書寫、文化地理學

* 本文為九十九學年度國科會補助專題計畫之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號：NSC 99-2410-H-152-01。又本文初稿〈記憶之城・虛構之城——《灤京雜詠》中的上京論述〉曾宣讀於2011年「抒情與敘事的多音交響——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承蒙講評人蕭麗華教授與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卓見，讓本文的論述能得到深化與補正的機會，謹此致謝。

**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1 年 10 月 21 日，審查通過日期：2011 年 12 月 14 日

一、前言

上京，蒙元帝國的草原都城。元憲宗九年（1259）建成於金蓮川草原¹（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內），初名開平。中統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汗（Khubilai Khaghan, 1215-1294）在此登基，繼承蒙古汗位。中統四年（1263）升為都城，隔年（1264）將燕京（今北京）更名中都，開平加號上都，²確立兩都制，³元代帝王開始隨季節流轉，定期⁴巡狩於兩個帝國都城。⁵兩都制的施行與元王朝的特殊性應

¹ 魏堅：〈元上都的考古學研究〉，《元上都》（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年），頁4，「元憲宗六年（1256）三月，忽必烈命劉秉忠在桓州東、灤河北『選地建城郭，三年建成』。」

² 宋濂等著：《元史·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350，「五年，以闕庭所在，加號上都，歲一幸焉。」

³ 所謂的兩都制是以中都為正都，上京為陪都，從政治的角度考量，二者的地位各有側重，如陳高華、史衛民：《元上都》（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頁28，「開平和燕京，一個是忽必烈『潛邸』的根據地，一個是當時治理漢地的中心，對忽必烈來說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此說目前已得到元史研究者的普遍認同，如周良霄、顧菊英：《元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280，「並建兩都既是出乎兼控中原漢地與蒙古宗親的需要，也是游牧行國風俗的繼承」；魏堅：〈元上都的考古學研究〉，《元上都》，頁19，「開平和燕京，一個是忽必烈『潛邸』的根據地，一個是當時治理漢地的中心。在燕京定都，符合漢人地主階級幫助蒙古統治者建立正統王朝的願望，可以加強蒙古政權在中原的統治；提高開平的地位，可以作為聯繫蒙古本部的中心，保持蒙古舊俗，對蒙古統治者也是至關重要的。」

⁴ 元代帝王往返與停駐上京的時間，雖屬「定期」，但因帝王所好，仍有差異，一般而言多停駐半年左右，參見史衛民：《元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頁352，「二三月份，元朝的皇帝往往要動身前往上都，開始一年一度的『巡狩』活動。世祖忽必烈和成宗鐵穆耳在位時，一般在二月份離開大都，九月或十月從上都返回。武宗海山把巡幸上都的時間確定在三月至九月，嗣後習慣於草原生活的皇帝如英宗碩德八剌、泰定帝也孫鐵木爾等，都遵循三月至九月的巡幸時間；習慣於中原漢地生活的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文宗圖帖睦爾及順帝妥懽帖睦爾等，由於對草原的寒冷氣候不太適應，都盡量縮短在上都的時間，往往在四月或五月才從大都出發，七月即從上都南返。」

⁵ 蘇天爵：〈中書參議府左右司題名記〉，《滋溪文稿》（臺北：中央圖書館，1970年），卷2，頁77，「先王之巡狩也，蓋省觀民風，設施政教，非以縱游田兒事晏樂也。昔我世祖皇帝肇作兩京，歲時巡幸，振民布政，發號施令。遠則邊徼咸畏其威，近則臣民不知其勞，是亦先王尋省之遺意歟」；熊夢祥：《析津志輯佚·古蹟》（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有密切關係，因為蒙元帝國不只是統治全中國⁶的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也是跨越亞歐的世界帝國，「元朝諸帝為保持在蒙古世界中領導的合法性，不能僅以中原『皇帝』自居，立法施政亦須自蒙古『大汗』的觀點著眼」，⁷所以「留駐大都是確定自己的權力及於中原領土，而歸返上京，則是保持其對蒙古帝國的統治」。⁸作為面向蒙古世界的都城，⁹上京在空間實踐上，一方面拆遷汴京（今河南省開封市）的熙春閣為宮城中心的大安閣，將宋金兩朝使用過的中國式宮殿建築移植於上京，並重新命名為「大安」，¹⁰象徵承繼中原王朝的正統；另一方面則又沿襲蒙古舊制，在上京設蒙語稱「失刺斡耳朵」（*sira ordo*）的蒙古包式大宮帳，¹¹顯示其對蒙古傳統的捍衛。相較於傳統的中國城市，上京無疑充滿異國色彩，是一座既是「中國」又不是「中國」的城市。

由於兩都制的施行，大量的官員隨著元代帝王穿行於蒙古大草原，並進入草原之中的上京，這些官員步履所及之地，是漢族王朝時代國土地圖之外，遙遠、

年），頁 116-117，「每聖上巡幸上都者，蓋亦行國賦民力，其聖慮周知，非實以清暑為事也。」

⁶ 就中國歷史而言，元朝是統治全中國的統一王朝，而非對峙、爭戰的分裂王朝，蕭啟慶：〈元朝的統一與統合：以漢地、江南為中心〉，《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9 年），頁 14，「繼秦、隋二朝，元朝締造了中國史上的第三次大統一。自唐朝衰亡，中國陷入分裂與擾攘之中近四百年。先有五代十國之割據，後有宋遼夏及宋金夏的對峙與爭戰。南北對立，干戈不休的局面直至蒙元統一中國始告結束。」

⁷ 蕭啟慶：〈蒙元統治與中國文化發展〉，《元代的族群文化與選舉》（臺北：聯經出版社，2008 年），頁 24。

⁸ 李嘉瑜：〈上京紀行詩的「邊塞」書寫——以長城、居庸關為論述主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14 期（2008 年 7 月），頁 4。

⁹ 相較於面向蒙古世界的上京，至元九年（1272 年）更名為大都的中都，就是一座面向漢人世界的典型中國式城市，傅海波、崔瑞德編，史衛民等譯：《劍橋中國遼夏金元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524，「1266 年，他下令建造漢人稱為大都而突厥人稱汗八里的城市。蒙古人直接從漢語翻譯，稱它為大都，盡管回回人監督這項工程並且有大量外國工匠參與建設，在概念上和風格上這座城還是中國式的。因為忽必烈希望大都作為他努力吸引傳統的漢人儒士的象徵，設計者遵循了中國模式。」

¹⁰ 虞集：〈跋大安閣圖〉，《道園學古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10，頁 1207-157，「世祖皇帝在藩，以開平為分地，即為城郭宮室。取故宋熙春閣于汴，稍損益之，以為此閣，名曰大安。」

¹¹ 熊夢祥：《析津志輯佚·古蹟》，頁 116，「刺斡耳朵者，即世祖皇帝之行在也。」

神秘與野蠻的異域。這趟旅程雖在帝國的內部，但對於非蒙古族的官員而言，仍然充滿異域的陌生感。兩都間的往返，於是成為元詩中不斷被書寫的主題，《文淵閣書目》中的元詩總集，錄有「元上京紀行詩，一部一冊，闕」，¹²此書雖已佚失，但仍可佐證——以上京與上京旅程為主題的詩作，在數量上已能彙編成冊。事實上，上京書寫一直是元詩中最重要焦點之一，「幾乎整個元朝的文人都曾參與到上京紀行詩的寫作、賦和、閱讀、評價和傳誦過程中」。¹³換言之，無論就數量之多還是參與者之眾，都可標示出上京書寫在元詩中的位置。

上京在元末毀於多次的戰火與劫掠，未曾修復重建，¹⁴上京書寫因而斷絕，後世讀者只能在元人的上京書寫中，想像與召喚這座草原都城的斷片，上京書寫也因此成為元詩中的獨特主題。

¹² 楊士奇等編：《文淵閣書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年），卷10，頁16。《文淵閣書目》所列者為總集，從題名觀之，收錄的應是元代以上京與上京旅程為主題的詩作，此書雖已佚失，但在元人文集中，仍可尋見數量可觀的上京紀行詩，或直接以「上京紀行」標目，如黃潛：《黃文獻公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4年），卷1，頁17，有「上京道中雜詩十二首」；李穀：《稼亭先生文集》（首爾：景仁文化社，1973年），頁470-473，有標目為「灤京紀行」者，共八首；納新：《金臺集》（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卷2，頁407-25至407-27，有標目「上京紀行」者，共十三首。或以上京與上京旅程之風物人情入詩者，以馬祖常為例，馬祖常：《石田文集》（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頁402-418，有〈上京書懷〉；頁402-439，有〈上京翰苑書懷〉三首；頁402-440，有〈次韻王參議寄上京胡安常諸公〉四首；頁402-452，有〈寄姚參政上都〉、〈駕發上京〉；頁402-457，有〈李陵臺〉二首；頁402-462，有〈上都翰林兩壁圖〉；頁402-466，有〈丁卯上京〉四首。上述之例，可以佐證，《元上京紀行詩》能彙編成冊，是源於元詩中上京紀行數量之多。

¹³ 邱江寧：〈元代上京紀行詩論〉，《文學評論》第2期（2011年2月），頁135。此外，楊鐮：《元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頁643-651，亦認為「在元代『上京紀行詩』與『宮詞』，幾乎是每一個文臣的必修功課。」

¹⁴ 石田千之助著，包國慶譯：〈關於元上都〉，《元上都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3，「隨著元朝的滅亡上都逐漸頹廢，再也沒有進行過修復，從明、清到現在，五百多年的歲月裡，昔日的故宮和城牆的斷垣殘壁已是雜草叢生，無人問津」；董廬：〈元上都略考〉，《元上都研究文集》，頁35，「至元順帝妥歡帖穆爾汗，國亡出塞，明兵進擊，常遇春兵入開平，上都被燒，自後此地，即永淪塞外，到現在幾乎都被人忘掉了。」

《灤京雜詠》被稱為「元代『最後的』上京紀行詩」，¹⁵當代有關《灤京雜詠》的研究，多著重於為其尋求文學的審美價值，如「首先，《灤京雜詠》寫景能緊扣地方特色，再現蒙古大草原的清新壯闊景象」、「其次，《灤京雜詠》中還有不少受人稱道的『風韻』之作」、「《灤京雜詠》的寫景描物的新奇給人印象尤為深刻」，¹⁶或認為「詩人懷舊之情相當真切感人，詩中多有新警之句」，¹⁷這類研究確實有其意義，但往往無法凸顯《灤京雜詠》的特殊性，¹⁸因為《灤京雜詠》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其觀看上京的角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灤京雜詠》的「故宮禾黍之感」，「與孟元老之《東京夢華錄》、吳自牧《夢粱錄》、周密之《武林舊事》同一用意矣」，¹⁹也就是說《灤京雜詠》中的上京如同前述三者，都是建構於記憶之土的記憶之城。這種觀看角度，不是現時現地的觀看，而是在這座城市已經永遠消逝之後，於回憶中展示。這是《灤京雜詠》與其他元代詩人的上京紀行詩之間最大的區隔，因為「所謂的『紀行』標示著這是非虛構性的實際旅行經歷，上京紀行詩因而具有一種『在路上』的旅遊特質」，²⁰所以上京紀行詩多採用現地紀行與當下抒懷的方式來表述，描述的是此刻目光所觸及的上京，而《灤京雜詠》則是在元王朝覆亡之後，以記憶重構那座曾經繁華似錦，卻已經永遠消逝的都城。

本文的論述將以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作為主要參考架構，其認為文學作品對於地理的描述，並非如同鏡像般映照地景，而是透過個體主觀經驗賦予空間意義，²¹所以研究者應該探察文學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建構空間。作為文

¹⁵ 楊鐔：《元詩史》，頁 646。此外，楊鐔：《元代文學編年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年），頁 606，亦稱「《灤京雜詠》是『最後的』上京紀行詩和自成系統的元宮詞。」

¹⁶ 史鐵民：〈再論楊允孚的《灤京雜詠》〉，《株洲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4 期（2006 年 8 月），頁 6。

¹⁷ 楊鐔：《元詩史》，頁 648。

¹⁸ 以這種研究視角切入，多只能得到「《灤京雜詠》作為詩歌雖然從整體上被視為一般之作，但其中仍不乏可誦之篇」的結論，認為其雖屬平庸之作，但仍有可讀的篇章。引文參見史鐵民：〈元末詩人楊允孚及其《灤京雜詠》〉，《古籍研究·2005 卷下》（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13。

¹⁹ 四庫館臣：《灤京雜詠提要·灤京雜詠》（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 年），頁 1 下。

²⁰ 李嘉瑜：〈不在場的空間——上京紀行詩中的江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18 期（2010 年 7 月），頁 53。

²¹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5 年），頁 59，「地理學和文學都是有關地方與空間的書寫。兩者都是表意作用（signification）」

學文本，《灤京雜詠》究竟用什麼方式來重構上京？而通過「回憶」這種特殊的觀看視角，《灤京雜詠》所再現的上京，又會與其他元代詩人所書寫的上京，有什麼差異呢？這些都是本文希冀回應的論題。以下我們就環繞著這些思索，展開討論。

二、書寫的位置——楊允孚與《灤京雜詠》

楊允孚（約 1316-1376），²²字和吉，號西雲，吉水人（今江西省吉水縣），²³著有《灤京雜詠》、《西雲小草》、《野人雜錄》、《悟非小稿》、《孝友吟》，²⁴除《灤京雜詠》外，其餘皆已佚失。由於《元史》無傳，楊允孚的生平，目前只能通過選本中的傳略²⁵與同世代文人的詩文²⁶進行建構。

在楊允孚的生平研究中，有兩項重要的人生歷程，關係著《灤京雜詠》的定位。其一是他在元王朝的仕宦情形，其次是在易代鼎革之際的自我認同與身分歸屬。前者將決定《灤京雜詠》中的上京旅程是真實或虛構，後者則能展示《灤

過程，也就是在社會媒介中賦予地方意義的過程」、「文學並非映照著世界的鏡子，而是複雜的意義蛛網的一部分」（頁 76）。

²² 楊允孚的生卒年，主要依據楊鐔：《元詩史》，頁 646。此外，史鐵良：〈元末詩人楊允孚及其《灤京雜詠》〉，《古籍研究·2005 卷下》，頁 109，則以楊允孚好友郭鈺的生卒年與哀輓詩，推判「楊允孚死于郭前，其卒年應在洪武五年至洪武九年之間。元亡前後，楊郭二人均已年老，年齡相近，那麼，楊的生年也當在延佑三年左右。」洪武五年是 AD 1372，洪武九年是 AD 1376，延佑三年是 AD 1316，可知史鐵良與楊鐔的推判是相同的，只是楊鐔在卒年部分取較寬宥的洪武九年。

²³ 顧嗣立編：《元詩選·初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1959，「允孚，字和吉，吉水人」；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年），卷 29，頁 31，「楊和《灤京百詠》一卷。號西雲，翰林供奉。一云名和吉。」

²⁴ 史鐵良：〈元末詩人楊允孚及其《灤京雜詠》〉，《古籍研究·2005 卷下》，頁 110-111，對其著作進行考探，認為「除《灤京雜詠》外，楊允孚還著有《西雲小草》、《野人雜錄》、《悟非小稿》，總為一集，見楊士奇〈楊和吉詩集附蕭德與故宮遺錄〉，據道光《吉水縣志》，楊允孚還有《孝友吟》，可惜都已不傳。」

²⁵ 顧嗣立編：《元詩選·初集》，頁 1959，有楊允孚傳略。

²⁶ 楊允孚的好友郭鈺存有《靜思集》十卷，集中有〈題楊和吉灤京詩集〉、〈楊和吉西雲亭賞菊和韻〉、〈寄楊和吉〉、〈送楊和吉過龍興〉、〈西雲亭種菊未開，以余歸期逼迫，時預賞之即賦〉、〈寄楊和吉歐陽文周〉、〈和龍西雨韻和楊和吉〉、〈和楊和吉〉二首、〈答楊和吉韻〉、〈哀楊和吉〉等詩是與楊允孚有直接關聯的往來之作。

京雜詠》對於上京的觀看視角。

關於楊允孚在元王朝的仕宦情形，至少有兩種說法，一是未仕之說，一是曾在元順帝（1320-1370）時任尚食供奉之官。前者所據是羅大已（生卒年不詳）在《灤京雜詠·後跋》中的「楊君以布衣從當世賢大夫遊，襆被出門，歲走萬里」，²⁷可知其認為楊允孚曾以平民之身與士大夫交遊，但並未說明其後是否入仕，因而衍申未仕之說。²⁸四庫館臣曾針對未仕之說進行辯駁，以《灤京雜詠》第四十九首的子注：「每湯羊一膳，其數十六，餐餘必賜左右大臣，日以爲常。予嘗職賜，故悉其詳」，²⁹其中的「予嘗職賜，故悉其詳」以作者之言，指證其曾供職元廷，並由所掌職務，判定「則亦順帝時尚食供奉之官，非游士矣」。³⁰除此之外，《灤京雜詠》第一〇一首：「始我來京一布衣，故人曾見未生時。等閒只作江南別，官有清名卷有詩」；³¹郭鈺（1316-1376）〈題楊和吉灤京詩集〉：「貞元朝士幾人在？少年詩思千載名」；³²金幼孜（1368-1432）〈灤京百詠集序〉：「先生在元時以布衣職供奉，嘗載筆屬車之後」³³等，皆可佐證楊允孚曾經出仕，而非一介布衣。³⁴由此看來，《灤京雜詠》中的上京旅程顯然不是出自想像，而是作者實際的旅行經歷，換

²⁷ 羅大已：《灤京雜詠·後跋》（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頁1上。

²⁸ 楊士奇：《東里續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卷19，頁1242-695，「和吉名允孚」、「嘗以布衣客燕都，往來兩京。」

²⁹ 楊允孚：《灤京雜詠》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頁6下。

³⁰ 四庫館臣：《灤京雜詠提要·灤京雜詠》，頁1上。

³¹ 楊允孚：《灤京雜詠》下，頁6下。此詩說明楊允孚來京時雖是「一布衣」，但其後卻是「官有清名」，可知其確實曾經入仕。

³² 郭鈺：〈題楊和吉灤京詩集〉，《靜思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卷3，頁1223-338，「貞元朝士幾人在？」中的「貞元」典出劉禹錫〈聽舊宮中樂人穆氏唱歌〉中的「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且元成宗鐵穆耳年號亦為「貞元」，所以此處應是借指前朝，而將楊允孚置於「朝士」之列，則可佐證楊允孚曾在元代入仕。

³³ 金幼孜：〈灤京百詠集序〉，《文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卷7，頁1244-561，其說明確指出楊允孚「以布衣職供奉」。

³⁴ 此種說法已得到研究者普遍的認同，如楊鐮：《元詩史》，頁647，稱其「在順帝宮廷之中任尚食供奉之官」；史鐵良：〈元末詩人楊允孚及其《灤京雜詠》〉，《古籍研究·2005卷下》，頁110，也有相同的看法，並更進一步指出「尚食供奉之官是皇帝近侍，屬宣徽院尚食局。」此外，邱江寧：〈元代上京紀行詩論〉，《文學評論》第2期（2011年2月），頁136，亦稱「他本是江西吉水人，『以布衣襆被，歲走萬里』，追隨上京隊伍，得以供職『尚食供奉之官』，從而留下著名的《灤京百詠》，令之青史垂名。」

言之，對於這個草原都城的繁華盛景與上京宮苑的華奢尊貴，楊允孚曾經親歷目睹，這使得《灤京雜詠》中的上京書寫具有紀實的基礎。³⁵

至於楊允孚在易代鼎革之際的自我認同與身分歸屬，羅大已《灤京雜詠·後跋》稱「君固已杜門裹足，歸老故山」，³⁶可知楊允孚在寫作《灤京雜詠》時，早已歸隱山林。郭鈺的「豈知歸去煙塵驚，山中閉門華髮生」，³⁷則進一步揭示他的離職歸隱應在元亡之前。其後元明易代，楊允孚始終未仕新朝，隱逸終老，這在郭鈺與楊允孚往來詩作中習慣性標示的隱逸話語，如「長歌把酒酌淵明，歸來三徑今何在」、³⁸「層層重菊繞籬斜，秋色偏歸處士家」、³⁹「琅玕細簟涼如水，應掃桂花彈素琴」⁴⁰等可以得到印證。此外，郭鈺其人「少負奇氣，元末遭亂，隱居不仕」、「不忘故國，抗跡行吟，志操可以概見」，⁴¹而被他稱之「惟君與我過從近」⁴²的楊允孚，二者在面對歷史世變與社會變遷時，所抱持的態度無疑是接近的，如在易代之際，都選擇隱居不仕的「遺民」⁴³身分，換言之，他們將自己定位為舊朝前臣，「元明易代雖然是中國史上第一次全面的『由夷入夏』，但真正影響士人對

³⁵ 金幼孜：〈灤京百詠集序〉，《文靖集》，卷7，頁1244-562，即強調《灤京雜詠》的紀實性，「後之君子欲求有元兩京之故實與夫一代興亡之故，尚於先生之言有徵乎！」

³⁶ 羅大已：《灤京雜詠·後跋》，頁2上。

³⁷ 郭鈺：〈題楊和吉灤京詩集〉，《靜思集》，卷3，頁1223-337至1223-338，

³⁸ 郭鈺：〈楊和吉西雲亭賞菊和韻〉，《靜思集》，卷4，頁1223-342。

³⁹ 郭鈺：〈西雲亭種菊未開，以余歸期逼迫，時預賞之即賦〉，《靜思集》，卷7，頁1223-370。楊允孚號西雲，居處有西雲亭，西雲亭種有竹菊，除此首外，郭鈺另有〈楊和吉西雲亭賞菊和韻〉，此外，〈題楊和吉灤京詩集〉，《靜思集》，卷3，頁1223-338，言「西雲亭上何日到，為君舞劍歌灤京」；〈和龍西雨韻寄楊和吉〉，《靜思集》，卷7，頁1223-373，「獨有西雲亭上客，金錢買酒敵春寒」；〈哀楊和吉〉，《靜思集》，卷9，頁1223-388，亦有「重到西亭淚自垂，更從何處共襟期。」

⁴⁰ 郭鈺：〈寄楊和吉〉，《靜思集》，卷7，頁1223-362。

⁴¹ 《靜思集·提要》，頁1223-309。

⁴² 郭鈺：〈答楊和吉韻〉，《靜思集》，卷8，頁1223-383。

⁴³ 本文對「遺民」的界定，採用蕭啟慶之說，見氏著：〈元明之際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擇——以各族進士為中心〉，《元代的族群文化與選舉》，頁255，「『遺民』乃指易代之後，仍然心懷元室，不願改仕新朝的士人」。此外，郭鈺：〈乙巳夏五月茶陵永新兵奄至，遂走淦西暑雨涉旬，米薪俱乏，旅途苦甚，因賦詩示諸同行〉，《靜思集》，卷8，頁1223-381，「白髮遺民真可哀，途窮猶望北兵來」，即自稱為「遺民」。

生死與仕隱抉擇的因素是『君臣大義』，而不是『夷夏之辨』，⁴⁴所以他們在作品中毫不避諱的流露故國之思，⁴⁵郭鈺稱「盲廢倦題新甲子，醉來謾說舊山川。貞元朝士今誰在？東郭先生每自憐」，⁴⁶楊允孚亦言「試將往事記從頭，老鬢征衫總是愁。天上人間今又昔，灤河珍重水長流」。⁴⁷Italo Calvino（1923-1985）認為「對那些經過卻沒有進入的人而言，這座城市是一個樣子；對那些身陷其中，不再離開的人，則是另一個樣子。你第一次到達時，有一座城市；你離開而且永不歸來時，又有另一座城市」。⁴⁸當楊允孚以「遺民」的身分，懷著對於前朝深厚的情感，一首詩接著一首詩，書寫這座已經毀滅的城市曾經的繁華，這種幾近永恆的回望與離開者的觀看視角，將讓他在描述上京時，始終看到的都是美好的過往。

三、意義化的空間——《灤京雜詠》的空間書寫次序

《灤京雜詠》是以上京與上京旅程為主題的七絕，共一〇八首組成，並以子注的形式，對上京與上京旅程的風物人情進行知識性的說明。全書敘述的內容可概分為三：第一部分敘述大都到上京的旅程，第一首詩的子注標示：「此以下多述途中之景」，⁴⁹以大都外城北面的建德門⁵⁰為起點，「今朝建德門前馬，千里灤京第

⁴⁴ 蕭啟慶：〈元明之際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擇——以各族進士為中心〉，《元代的族群文化與選舉》，頁 269。

⁴⁵ 郭鈺與楊允孚並非特例，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遺民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233，即言「明初士人的『元遺心態』，是一種太公然的事實，有關諸人當其時不屑於掩飾，在有明一代也不大像是禁忌的話題。」

⁴⁶ 郭鈺：〈癸丑首正〉，《靜思集》，卷 9，頁 1223-389。

⁴⁷ 楊允孚：《灤京雜詠》下，頁 7 上。

⁴⁸ 伊塔羅·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8 年），頁 155。

⁴⁹ 楊允孚：《灤京雜詠》上，頁 1 上。

⁵⁰ 大都外城的北面有二門，一是建德門，一是安貞門，元代帝王的兩都巡狩都是由建德門出發。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21，頁 250，「城方六十里，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門，正南曰麗正，南之右曰順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東曰安貞，北之西曰健德；正東曰崇仁，東之右曰齊化，東之左曰光熙門；正西曰和義，西之右曰肅清，西之左曰平則。」在大都齊整對稱的建築布局中，北面只開二門無疑是奇特的，元代文獻對此未有任何說明，陳高華、史衛民：《元代大都上都研究》（北京：中國

一程」，⁵¹行至上京城外，「歡喜坡邊望禁城，鸞翔鳳翥卿雲清」。⁵²第二部分與第三部分則以文字見證他所親歷的上京，前者是「敘灤京之景及聖駕往還典故之大槩」，⁵³後者「多敘一年之景并雜詠之物」。⁵⁴

《灤京雜詠》第一部分著重在展示旅程所見，在空間書寫方面是依時間順序而下，因而呈現如射線般的線性結構。第二部分與第三部分則側重於上京的城市書寫，由於跳脫了旅程的線性結構，敘述者必須在完整、不可分割的城市整體中，抽繹出敘述的脈絡，如同 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 所言的：「所有場面在同一個地點，沒有重疊，也不透明，我眼睛看到的事是同時發生的，我記敘下來的卻有先後順序，因為語言有先後順序」，⁵⁵換句話說，敘述者往往將對於城市的想像與情感附著於文字中，再以文字層層構築屬於他的那座城，而空間敘述的先後次序與輕重取捨，則可以呈現敘述者對於空間意義的判斷。

在《灤京雜詠》第二部分，通過御天門，⁵⁶進入上京的宮城，⁵⁷在盛宴之後，楊允孚首先描述的是大安閣與水晶殿：「大安閣下晚風收，海月團圓照上頭。誰道人間三伏節，水晶宮裏十分秋」，⁵⁸此詩的子注標示：「大安閣，上京大內也，別有

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42，則認為這與哪吒傳說有關，「哪吒三頭六臂兩足，南面三門象徵三頭，東西六門象徵六臂，北面兩門象徵兩足。」

⁵¹ 楊允孚：《灤京雜詠》上，頁 1 上。

⁵² 同前註，頁 4 上。

⁵³ 同前註。

⁵⁴ 楊允孚：《灤京雜詠》下，頁 2 下。

⁵⁵ 博爾赫斯著，王永年譯：〈阿萊夫〉，《小徑分岔的花園》（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 年），頁 122。

⁵⁶ 御天門是上京宮城的正門，楊允孚：《灤京雜詠》上，頁 4 下，第三十三首子注，「千官至御天門俱下馬徒行，獨至尊騎馬直入，前有教坊歌女引導且歌，玉階乃止，內門曰御天之門」；又胡助：〈灤陽雜詠〉之六，《純白齋類稿》（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4 年），卷 14，頁 127，則稱「御天門前聞詔書，驛馬如飛到大都。」陳高華、史衛民：《元上都》，頁 99，認為在上京的三門之中，「南邊的御天門最為重要，它與皇城的南城門在一條線上，是出入的主要通道」；魏堅：〈元上都的考古學研究〉，《元上都》，頁 25，亦言「宮城御天門是百官集聚，奉旨聽宣的地方。」

⁵⁷ 陳高華、史衛民：《元上都》，頁 98，「上都城由宮城、皇城、外城組成，皇城在全城的東南角，宮城則在皇城的中部偏北。」

⁵⁸ 楊允孚：《灤京雜詠》上，頁 5 上。

水晶殿」。⁵⁹大安閣原是北宋龍德宮的熙春閣，至元三年（1266），忽必烈汗下令，將其自汴京遷移至上京的宮城中心，更名「大安」。大安閣的被遷移誇耀了蒙古帝王的權力，並以漢式的宮殿宣示他是中國的統治者。在這座宮殿中，帝王「登基、臨朝、議政、修佛事、與諸王、大臣聚會、接見外國使者」，⁶⁰其功能性與重要性相當於大都宮城的大明殿。⁶¹水晶殿是大安閣的別殿，以水晶命名，是因其與「通用玻瓈飾，日光回彩，宛若水宮中」⁶²的大明殿皆以玻瓈裝飾，⁶³光影潏潏，清冷華美，元代帝王常在此殿中「舉行宴會，或處理政務」。⁶⁴毫無疑問，大安閣與水晶殿是上京宮城中最重要的政治性符號與儀典場所，而這也正是楊允孚上京書寫所選擇的起點。

其次，被展示的空間是位於上京皇城西門之北的櫟毛殿：「北極修門不暫開，兩行宮柳護蒼苔。有時金鎖因而掣，聖駕櫟毛殿裏回」，⁶⁵此詩的子注標示：「櫟毛殿在大幹耳朵」。⁶⁶「大幹耳朵」又作「失刺幹耳朵」、「昔刺幹耳朵」，⁶⁷是一種「深

⁵⁹ 同前註，頁 5 上。

⁶⁰ 魏堅：〈元上都的考古學研究〉，《元上都》，頁 50。

⁶¹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 21，頁 251，「大明殿，乃登極、正旦、壽節、朝會之正衙」；史衛民：《大一統——元至元十三年紀事》（北京：三聯書店，1995 年），頁 16，「宮城中的正殿大明殿，是皇帝正旦、壽節舉行朝賀禮儀的地方，也是忽必烈與蒙古宗王、群臣會集議事和接見外國使節的主要場所。」

⁶² 蕭洵：《故宮遺錄》（臺北：世界書局，1963 年），頁 3。

⁶³ 水晶殿以玻瓈裝飾一事，目前已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認同，如石田千之助著，包國慶譯：〈關於元上都〉，《元上都研究文集》，頁 11，「筆者認為周氏〈詐馬行〉中所贊頌的『水晶殿閣搖瀛蓬』的詩句與前述『上京六月如初冬，金支滴露冰華濃』的詩句不單是在形容水晶殿的涼爽，而和前面提到的詩句一樣很可能是在形容玻璃上的冰華」；陳高華、史衛民：《元上都》，頁 104-105，「詩人云：『誰道人間三伏節，水晶宮裏十分秋』，『冰華雪翼眩西東，玉座生寒八面風』。『冰華雪翼』之喻，可能就指『用玻璃飾』而言」。

⁶⁴ 陳高華、史衛民：《元上都》，頁 105；魏堅：〈元上都的考古學研究〉，《元上都》，頁 54，亦言「元朝皇帝常在殿中舉行宴會或處理政務。」

⁶⁵ 楊允孚：《灤京雜詠》上，頁 5 下。

⁶⁶ 同前註。

⁶⁷ 陳高華、史衛民：《元上都》，頁 121，「在元代文獻中，失刺也作昔刺，都是蒙語黃色一詞的音譯。幹耳朵是營帳」；魏堅：〈元上都的考古學研究〉，《元上都》，頁 68，「大幹耳朵就應當是失刺幹耳朵」，可知「失刺幹耳朵」、「昔刺幹耳朵」、「大幹耳朵」，三者為一。

廣可容數千人」⁶⁸的蒙古包式大宮帳，⁶⁹而在這些宮帳建築群中，又以梭毛殿⁷⁰最為重要，因為這是元代帝王以蒙古大汗的身分宴請宗室貴族與朝臣，舉行詐馬筵（jamah）⁷¹的場所。值得注意的是在開宴之前「必一二十大臣稱吉思皇帝禮撒于是，而後禮有文飲有節矣」，⁷²「禮撒」（jasgh）即法令，朗讀成吉思汗的禮撒，其實是面向蒙古世界，承諾不忘蒙古舊俗。換句話說，不同於大安閣舉行的漢儀，梭毛殿是蒙古儀典施行的場所，元代帝王在此宣示，他不僅是中國的皇帝，也是蒙古世界帝國的統治者，梭毛殿因而成為銘刻政治寓意的空間符號。

在梭毛殿之後，隨之展開的則是對於上京宮城的描述，如「曲曲闌干兔鹿馴，雨肥綠草度青春。主來不避韓盧獵，慣識金衣內貴人」⁷³點出宮城之內，樓閣之旁，曲曲延伸的闌干間，有兔鹿形跡掩映在叢生的綠草中，⁷⁴而韓盧般優異的獵犬習慣

⁶⁸ 柳貫：〈觀失刺斡耳朵御宴回〉注，《柳貫詩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卷5，頁86，「御宴設氈殿失刺斡耳朵，深廣可容數千人。」

⁶⁹ 史衛民：《元代社會生活史》，頁163，「斡耳朵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可以遷移的，一種是固定不動的。後者比前者的規模要大得多。無論哪一種斡耳朵，都有一個環繞它的龐大帳幕群。來自西方的傳教士驚奇地看到蒙古人的帳幕伸延數里，就像一座大都市。」本文所述的大斡耳朵屬於固定不動的斡耳朵，為巨大的圓形氈帳。

⁷⁰ 梭毛殿是上京宮帳建築群中最高大宏廣者，陳高華、史衛民：《元上都》，頁124，指出「據元代官修政書《經世大典》記載，泰定二年二月十六日，『敕造上都棕毛殿鋪設，首下隨路民匠為之。九月十三日輸之留守司。成造地毯兩扇，積二千三百四十三尺』。從地毯的面積不難想見該殿可容千人以上。」又Marco Polo著，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頁166，將其稱之為「竹宮」，「此草原中尚有別一宮殿，純以竹莖結之，內塗以金，裝飾頗為工巧。宮頂之莖，上塗以漆，塗之甚密，雨水不能腐之。」

⁷¹ 詐馬筵又稱質孫宴，是元代各種宴會中規模最大、耗資最鉅者。韓儒林：〈元代詐馬宴新探〉，《元上都研究文集》，頁357，認為其名是源於波斯語jamah，意「衣」，「質孫宴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預宴者必須穿戴御賜的質孫服，且以衣服的華麗相炫耀。」此外，王惲：〈大元故關西軍儲大使呂公神道碑銘〉，《全元文》6（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497，亦提及「必經賜茲服者，方獲預斯宴，予以別臣庶疎近之殊，若古命服之制。」

⁷² 楊允孚：《瀛京雜詠》上，頁6上。

⁷³ 同前註，頁7上。

⁷⁴ 上京宮城的殿閣間，應有馴養之兔鹿，除引詩外，胡助：〈瀛陽雜詠〉之二，《純白齋類稿》，卷14，頁127，亦稱「綠闌青草玉花驄，馴鹿遊眠殿閣東」，又Marco Polo著，馮

近身，可知帝王不時在此隨興行獵。又如「仙娥隱約上簾鉤，笑倚欄干出殿頭。鸚鵡臨階呼萬歲，白翎深院度清秋」⁷⁵則寫月下的宮殿，明月懸掛於簾鉤之上，靜夜殿前，鸚鵡嚶嚶地模擬人聲，高呼萬歲，透露了帝王曾經駐足的身影，而「寒暑常在北方」⁷⁶的白翎雀棲息於深秋宮院，則點出這是位於北方朔漠的宮殿。可以發現，在楊允孚對於宮城的凝視中，帝王的身影幾乎無所不在，因為上京原就是帝王所駐的都城，而宮城則是帝王的居處，環繞此地所進行的書寫，其實更接近所謂的宮詞，以展示宮廷生活為重心。

至於《灤京雜詠》的第三部分，主要聚焦於「一年之景并雜詠之物」，⁷⁷但亦不時觸及上京的皇城景觀，如「四月東風漸漸和，流波細細出官河。詩人策馬紅橋過，御柳今朝絲最多」⁷⁸寫上京春景，東風漸暖，流波晃漾，其中暗含著生命萌動的喜悅之情，當詩人策馬紅橋過時，驚覺楊柳已絲絲弄碧，「最多」則透顯春意深濃。在此，「官河」、「紅橋」、「御柳」約略勾繪出皇城之景。又如「雖然玉宇桂無花，秋比江南分外佳。絃管畫樓人散去，舍郎攜妓勸嘗瓜」⁷⁹則寫上京之秋，在嗅覺上雖然沒有江南秋天熟悉的金桂氣味，卻別有風情。因為絃管聲遠，畫樓人散後，就是攜妓月下嘗瓜⁸⁰的興味之事，其中「絃管畫樓」或也粗描出皇城的市街風情。

如將上述《灤京雜詠》對於上京的空間書寫，依序排列，由宮城中心的大安閣、水晶殿至皇城之外的櫻毛殿，再從宮城周邊到皇城剪影，可以發現其中的次序不是依照實際的地理方位，而是取決於「中心」的文化概念。「人文關係的『中』與天上的『中』相呼應，成為天人共有的特徵，而因為天象的證明，『中』在人間同樣具有了永恆意義，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⁸¹在人間擁有至高無上地位者應

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頁166，描繪上京宮城之景觀，「此宮有牆垣環之，廣袤十六哩，內有泉渠川流草原甚多。亦見有種種野獸，惟無猛獸。」

⁷⁵ 楊允孚：《灤京雜詠》上，頁7上。

⁷⁶ 宋濂等著：《元史·太祖本紀》，頁8，「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雁遇寒則南飛就暖耳。」可知白翎雀是常居北方的禽鳥。

⁷⁷ 楊允孚：《灤京雜詠》上，頁1上。

⁷⁸ 楊允孚：《灤京雜詠》下，頁3下。

⁷⁹ 同前註，頁5上。

⁸⁰ 同前註，第八十九首子注，「俗以月下送瓜往還。上京不產桂花。」

⁸¹ 唐曉峰：〈新石器時代市界秩序觀念的證據〉，《從混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論》（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90。

是帝王，《荀子》稱：「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⁸²由此推展至空間秩序，則「國在宇宙之中央，京城在國之中央，王宮在城之中央」。⁸³大安閣與其側之水晶殿，原就位於上京宮城的中心，⁸⁴在政治寓意上更遠重於他者，所以應是中心中的重心；其次是面向蒙古世界的樛毛殿，由於元代宮廷儀制具二元性，「有關國家體制的場合（如皇帝即位、冊立皇后、太子及外國來朝）皆用漢儀，而有關蒙古統治階層的聚會（如宴饗宗親、大臣）皆用蒙古儀」，⁸⁵作為蒙古儀典施行的場所，樛毛殿亦居於中心的位置，重要性僅次於舉行有關國家體制儀典的大安閣。然後由中心至外部，隨重要性向外擴散，依序是帝王所居的宮城與宮城之外的皇城。⁸⁶由這種空間敘述的先後次序與內容的輕重取捨，可以發現《灤京雜詠》中的上京，本質上是屬於帝王的上京，而非庶民階層的上京，所以其敘述的重心多集中於蒙古帝王與貴族的宮廷生活。

四、雙軌的記憶重構——《灤京雜詠》的上京書寫

《灤京雜詠》的上京書寫是建立在「兵燹所過，莽為丘墟」⁸⁷的回望中，只是楊允孚不曾再回到上京，他從未真正見過這座城市的壞毀，而是在遙遠的江南故鄉，忽然聽聞上京已徹底毀於戰火，因而「帝里風光入夢頻」，⁸⁸換句話說，他所書寫的上京被封存在記憶、在過去的時空裡，是一座再也回不去的記憶之城，如同金幼孜所言的，「先生往來正當元君臣恬嬉之日，是以無轉瞬間，海內分裂，而

⁸² 荀況：〈大略〉第二七，《新編荀子》（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年），頁1997。

⁸³ 尹國均：〈中國古代建築的符號圖式〉，《符號帝國》（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年），頁118。

⁸⁴ 魏堅：〈元上都的考古學研究〉，《元上都》，頁51，「大安閣是一座位於宮城正中的，每層有中閣與耳房，具有高入雲霄尋偉氣勢的三層方形樓閣式建築。」

⁸⁵ 蕭啟慶：〈蒙元統治與中國文化發展〉，《元代的族群文化與選舉》，頁31。

⁸⁶ 上京的皇城主要是官署、寺院與市街所在，如陳高華、史衛民：《元上都》，頁113，「皇城內街道寬窄不等，主次分明，相互對稱。在皇城內設有許多官署、寺院和手工業作坊，但確切的位置已很難考定。」

⁸⁷ 羅大已：《灤京雜詠·後跋》，頁2上。

⁸⁸ 楊允孚：《灤京雜詠》下，頁7上。

灤京不守，遂為煨燼。數十年來元之故老殆盡，無有能道其事者」。⁸⁹

以書寫對抗時間之流中的遺忘，似乎是《灤京雜詠》寫作的起點，憑藉記憶，楊允孚以文字復現（repetition）已經永遠壞毀消逝的上京城。值得注意的是記憶並不等於過去的事實，因為「過去不是被保留下來的，而是在現代的基礎上被重新建構」，⁹⁰所以書寫者從過去召喚出記憶的點滴，轉譯為現在，這是一種重構的過程，Susanne. K. Langer（1895-1982）指出：「記憶篩選了所有的材料，再把這些材料用一種由有特色的事件構成的形式再現出來」。⁹¹《灤京雜詠》對於上京的重構，主要以雙軌交織著兩重的聲音，一是曾親歷其地者集體之記憶；一是作者個人的私密記憶，形成其獨特的上京空間書寫，現將茲分述於后。

（一）集體記憶之顯影

集體記憶中的上京，是曾經親歷上京繁華的人所共有的，「集體記憶可用以重建於過去的意象，在每一個時代，這個意象都是與社會的主導思想相一致的」，⁹²換句話說，這是一種位居時代主流的集體聲音與共同想像。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常被視為『集體記憶的所在』——透過連結一群人與過往的記憶建構來創造認同的場址」，⁹³如果我們將上京視為文化地理學所指稱的——「地方」（Place），⁹⁴那麼集體記憶的選擇，無疑是創造上京「地方感」（The sense of place）⁹⁵的重要元素。

⁸⁹ 金幼孜：〈灤京百詠集序〉，《文靖集》，卷7，頁1244-562。

⁹⁰ 莫里哀·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71。此一觀點，已為「記憶」相關研究所普遍認同，如所引的莫里哀·哈布瓦赫之說法是由社會學的角度切入；後引的蘇珊·郎格的說法是由符號美學入手；此外，宇文所安由文學角度探問「記憶」，亦有類似的看法：「回憶具有根據個人的回憶動機來構建過去的力量，因為它能擺脫我們所繼承的經驗世界的強制干擾，在『創造』詩的世界的詩的藝術裡，回憶就成了最優模式。」宇文所安之說，請參閱氏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頁149。

⁹¹ 蘇珊·郎格著，劉大基等譯：《情感與形式》（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1年），頁305。

⁹² 莫里哀·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頁71。

⁹³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公司，2006年），頁101。

⁹⁴ 同前註，頁14，將「地方」定義為「人類創造的有意義空間。它們都是人以某種方式而依附其中的空間。這是最直接且常見的地方定義——有意義的區位。」

⁹⁵ 同前註，頁15，「所謂的『地方感』，是指人類對於地方有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小說與

1. 神聖的都城

上京原就是蒙元帝國的草原之都，都城的位置使其被視為王權的象徵，作為帝王所駐的王城，「神聖性」因而成為上京獨特的場所精神（genius loci），⁹⁶在元人的上京書寫中恆常地被展示著，⁹⁷進而內化為集體之記憶。

《灤京雜詠》對於上京「神聖性」的建構，主要是利用上京建城的神話傳說，賦予其神聖化的存在價值，如「聖祖初臨建國城，風飛雷動蟄龍驚。月生滄海千山白，日出扶桑萬國明」，⁹⁸前二句敘述劉秉忠（1216-1274）借地於龍之事，「相傳劉太保遷都時，因地有龍池，不能乾涸，乃奏世祖當借地於龍，帝從之。是夜三更雷震，龍已飛上矣，明日以土築成基」，⁹⁹由此將上京所在定義為龍興之聖域，讓它與中國流行的天命學說結合，鞏固元王朝作為正統王朝的合理性，所以後兩句因日月而光亮的「千山」、「萬國」，也就成了盛世帝國中帝王恩澤所及之地。

除此之外，《灤京雜詠》亦常通過帝都的仙境化來展示上京的「神聖性」，如「四傑君前拜不名，輪番內值浹辰更。蓬萊山下群仙集，得似王孫世祿榮」，¹⁰⁰「四傑」即「啜里班·曲律」，指的是世襲四怯薛（Kesig）¹⁰¹之長的蒙古四大家族，¹⁰²

電影（至少那些成功的作品）時常喚起地方感——我們讀者／觀眾知道『置身那兒』是怎樣的一種感覺。」

⁹⁶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頁 60，所謂的「場所精神」指涉的是「某個地方獨一無二的精神。」

⁹⁷ 上京的「神聖性」是元人書寫上京時，經常被詮釋的面向，如虞集：〈書上京國子監壁〉，《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7，「神京極高寒，幽居了晨夜」；馬祖常：〈五月芍藥〉，《石田文集》，卷 4，頁 464，「上京不是春光晚，自是天家日景遲」；周伯琦：〈上京雜詩〉之一，《近光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年），卷 1，頁 509，「皇圖基正統，朔易建神京」；李穀：〈灤京〉之二，《稼亭先生文集》，頁 472，「聖人當日此龍飛，得卜神京萬世基」；傅若金：〈詠懷〉之二，《傅與礪詩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卷 5，頁 3，「獨夜起瞻龍虎氣，五雲終繞鳳凰城。」

⁹⁸ 楊允孚：《灤京雜詠》上，頁 4 下。

⁹⁹ 孔齊：〈上都避暑〉，《至正直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卷 1，頁 1 下。

¹⁰⁰ 楊允孚：《灤京雜詠》上，頁 5 上。

¹⁰¹ 所謂的「怯薛」是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制度，其在大蒙古國（Yeke Mongghol ulus）時期是皇家的衛隊與家務機關，是帝國的中央軍，也是主要的中央行政機構。到了元代，蒙古舊制受到調整，「怯薛」的權力被其他中國式的機構分享與取代，但「怯薛」卻從未官僚化，反而直屬於帝王，仍然保有相當大的政治權力。「怯薛」有四個輪值班，按

身為成吉思汗最親密的「伴當」¹⁰³之後裔，他們向來被視為蒙古貴族中最顯貴的家族，「蒙古征服漢地，立國中原後，它們又成為屹立於中國社會之上的蒙古征服貴族階層的最高層」。¹⁰⁴此詩前兩句著眼於四傑為王室執事的工作，後兩句則極寫其榮顯尊貴。值得注意的是在「蓬萊山下群仙集」中，帝王所在的上京宮闕被比擬為蓬萊仙山，扈衛於帝王身旁的四傑則被喻為群仙，類似之例還有「北闕東風昨夜迴，今朝瑞氣集蓬萊」、¹⁰⁵「曙色蒼茫閭闔開，相君有奏入蓬萊」、¹⁰⁶「麗日初明瑞氣開，千官錫宴集蓬萊」、¹⁰⁷「儀鳳伶官樂既成，仙風吹送下蓬瀛」，¹⁰⁸可以發現《灤京雜詠》刻意將上京與蓬萊加以連結，形成固定的比喻關係，這與元代對於上京的定位應有一定的關聯，「忽必烈統一中國後，定鼎在大都，為之取『本

一定的干支輪值，為王室執事，三日一更。『怯薛』成員為怯薛歹，由官吏子弟充當，怯薛長則由四大家族世襲。有關「怯薛」制度的研究，參見蕭啟慶：〈元代的宿衛制度〉，《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16-255。此外，史衛民：《大一統——至元十三年紀事》（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頁74，亦提及「忽必烈即位後，保留了這種宿衛組織，將『怯薛』作為皇帝的貼身扈衛，在大都時，以它保衛皇城；出行上都時，則充任大帳的護衛。『四怯薛』輪流值勤，從不間斷。」

¹⁰² 元明善：〈丞相東平忠憲王碑〉，《全元文》24，頁340，「忠武（案：指木華黎）與博爾兀、博爾忽、赤老溫佐太祖定天下，號為四傑。」由上可知，四傑原指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過程中功勳最高的四位功臣——木華黎、博爾兀、博爾忽、赤老溫，他們的家族因而成為世襲貴族。蕭啟慶曾對四大家族進行考探，認為「四傑之中，赤老溫家較其他家遠為隱晦。就仕進記錄言，這一家不過是蒙古貴族中的中上層，和其他三家世為膏粱華腴者不同。元人著作中雖多以四傑並稱，卻往往能分別其輕重」，可知到了元代，赤老溫家明顯已經式微，僅在名義上與其他三家並稱。蕭啟慶之說，參見氏著：〈元代四大蒙古家族〉，《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年），頁143。

¹⁰³ 蕭啟慶：〈元代四大蒙古家族〉，《元代史新探》，頁152，「『伴當』是蒙古氏族社會衰敗、封建社會形成過程中的產品。『伴當』多來自別一氏族或部族、投效於一聲勢已壯或前程似錦的氏族或部族族長，承認後者為主君（ejen）。他們是主君的『梯己奴婢』，與主君有個人從屬關係，有別於屬於全氏族或部族的世襲隸屬民及普通奴隸。伴當有為主君統御軍隊、擔任衛士及操作家務的責任，而主君也有給予伴當生計及保護的義務。」

¹⁰⁴ 蕭啟慶：〈元代四大蒙古家族〉，《元代史新探》，頁213。

¹⁰⁵ 楊允孚：《灤京雜詠》上，頁4下。

¹⁰⁶ 同前註，頁5下。

¹⁰⁷ 同前註，頁6上。

¹⁰⁸ 同前註。

乎天者親上』的意思，更名開平府爲『上都』，以示元上都都在天上」，¹⁰⁹當上京被解讀爲天上之都時，其實就被賦予了神聖空間（saced space）的性質，而蓬萊仙山在中國文化中「既是不死仙鄉、海上樂園，也是天堂、祖靈所居的聖域」，¹¹⁰通過二者的互相定義，更強化其神聖都城的意義。

2. 獵奇的異域

毫無疑問，對於元代的漢族文人而言，那是充滿想像的空間，上京與其所在的蒙古大草原。因爲在漢族王朝時期，那裡始終是國土地圖之外，遙遠、神秘與野蠻的異域，「至於文章之士，惟有勒石燕然之碑，其詩詠則未嘗聞也」，¹¹¹但在元代，上京被收納於帝國的內部，那曾經被未知覆蓋、難以理解的世界，開始有了進入的路徑。在這迢遙的旅程中，「旅行者雖未跨越帝國疆界，卻沉浸於異國情調中。以獵奇之眼觀看與凝視（gaze）漠北，於是成爲上京紀行詩最重要的書寫主題之一」，¹¹²《灤京雜詠》亦不例外，羅大已稱其「耳目所及，窮西北之勝，具江山人物之形，狀殊產異俗之瑰怪，朝廷禮樂之偉麗」，¹¹³指涉的就是這個面向。

《灤京雜詠》所組構的異域圖景，多緣於感官知覺，其中寒涼之氣候是其最常觸及的，如「灤京九月雪花飛，香壓萸囊與夢違。鴈字不來家萬里，狐裘旋買換征衣」，¹¹⁴第一句中「九月」與「雪花」的組合，點出上京氣候之異，經驗與記憶中的秋天應是「露下天高秋氣清」，¹¹⁵但上京卻已是漫天飛雪。第二句主要揭示自己的處境，習慣性地佩帶著重九萸囊，彷彿身在熟悉的故鄉，但現實偏與夢境

¹⁰⁹ 陸思賢：〈關於元上都宮城北牆中段的闕式建築基台〉，《元上都研究文集》，頁 73。

¹¹⁰ 高莉芬：〈蓬萊神話的海洋思維及其宇宙觀〉，《政大中文學報》第 6 期（2006 年 12 月），頁 122。

¹¹¹ 王士熙：〈題上京紀行詩後〉，《純白齋類稿·附錄》，卷 2，頁 212。類似的說法，還有羅大已：《灤京雜詠·後跋》，頁 1 上，「百年以來，海宇混一，所謂勒燕然、封狼居胥，以爲曠世希有之，遇者單車掉臂，若在庭戶。其疆宇所至，盡日之所出與日之所沒，可謂盛矣」；危素：〈贈潘子華序〉，《危太樸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卷 8，頁 451，「開平昔在絕塞之外，其動植之物，若金蓮、紫菊、地椒、白翎雀、阿藍之屬，皆居庸以南所未嘗有。當封疆阻，非將與使，弗至其地。」

¹¹² 李嘉瑜：〈不在場的空間——上京紀行詩中的江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18 期（2010 年 7 月），頁 53-54。

¹¹³ 羅大已：《灤京雜詠·後跋》，頁 1 上。

¹¹⁴ 楊允孚：《灤京雜詠》下，頁 5 下。

¹¹⁵ 杜甫：〈夜〉，《杜詩鏡銓》（臺北：華正書局，2000 年），卷 13，頁 657。

相違。第三句寫秋雁不來，家書難託，故鄉更在萬里之外。最後，詩人的筆觸又回到上京的寒涼，必須將旅程所著的「征衣」轉換為「狐裘」，非得如此，否則不足以抵抗上京之寒冷。又如「出塞書生瘦馬騎，野雲片片故相隨。凍生耳鼻雪堪埋，冷入肝腸酒強支」，¹¹⁶寫穿透耳鼻之寒凍，彷彿深埋於積雪中，寒意甚至鑽入肝腸，只能以酒勉強驅趕。此詩的子注稱：「凡凍耳鼻，即以雪揉之方回，近火則脫」，¹¹⁷其他如「誰把新吟向客題，一字成時筆如鐵」、¹¹⁸「買得香梨鐵不如，玻璃碗裏凍潛蘇」¹¹⁹等都是強調上京超出尋常經驗的寒涼。

飲食之異，是另一個辨別異域的重要符碼。¹²⁰因為書寫者往往攜帶著另一個城市的味覺習慣與印象，因而容易突顯異域的陌生感，如「怪得家童笑語回，門前驚見事奇哉。老翁攜鼠街頭賣，碧眼黃髯騎象來」，¹²¹子注言：「黃鼠，灤京奇品」，¹²²黃鼠¹²³入菜似乎是異域的新奇體驗，更奇特的是由碧眼黃髯又騎象的異族老者街頭叫賣，所以標出「驚見」、「事奇」。此外，磨菇、¹²⁴黃羊、¹²⁵對角羊¹²⁶等

¹¹⁶ 楊允孚：《灤京雜詠》下，頁6上。

¹¹⁷ 同前註，頁6上，第九十六首子注。

¹¹⁸ 楊允孚：《灤京雜詠》下，頁5下。

¹¹⁹ 同前註，頁6下，又同頁之第一百首子注，「梨子受凍，其堅如鐵，以井水浸之，則味回可食。」

¹²⁰ 以飲食之異作為上京書寫的重點，是上京紀行詩中常見的取材，並不僅見於《灤京雜詠》。如許有壬：〈上京十詠〉組詩，《至正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卷13，頁84，就分別以馬酒、秋羊、黃羊、黃鼠、糝麵、蘆服、白菜、沙菌、地椒、韭花等上京特有的飲食名物為題。

¹²¹ 楊允孚：《灤京雜詠》下，頁4上。

¹²² 同前註。

¹²³ 黃鼠是松鼠科動物，產於蒙古草原，元人多將其視為上京特產，如許有壬：〈黃鼠〉，《至正集》，卷13，頁84，「北產推珍味，南來怯陋客。」到了明代，黃鼠之味的評價則遠不如元代，如由元入明的賈銘，就稱「黃鼠肉，味甘性平。昔為上供，今不甚重之。」賈銘之說，參見氏著：《飲食須知》（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年），卷8，頁143。

¹²⁴ 楊允孚：《灤京雜詠》下，頁3下，「更說高麗生菜美，總輸山後磨菇香」，又同頁之第七十五首子注，「尖山產磨菇。」

¹²⁵ 楊允孚：《灤京雜詠》上，頁6下，「南土至奇誇鳳髓，北陞異品是黃羊」，又同頁之第四十七首子注，稱「黃羊，北方所產，御膳使用。」

¹²⁶ 楊允孚：《灤京雜詠》下，頁2上，「皮囊乳酒鑼鍋肉，奴視山陰對角羊」，又同頁之第六十五首子注，稱「橘綠羊，或四角六角者，謂之迭角羊，迭義未詳，以其角之相對，

都是作者記憶中上京的奇食異味。而熟悉之物象因空間的挪移，也會被更改屬性，如「時雨初肥芍藥苗，脆甘味壓酒腸消。揚州簾卷東風裏，曾惜名花第一嬌」，¹²⁷在江南，「揚州芍藥稱第一」，¹²⁸那是以賞玩品評的名花被認識，可是到了上京，芍藥卻成了脆甘味美的佐酒之物。而這些與認識經驗歧異之例，常被《灤京雜詠》記下，並不厭其煩的標注，藉此投影出異域之奇。

（二）私密記憶之回溯

從文學構形（configurations）的角度來說，《灤京雜詠》中的上京不只是神聖的都城，是獵奇的異域，也是一座附著作者個人私密記憶的想像之城，個人記憶的私密性、獨特性，將賦予這座城市獨一無二的性格，使其有別於集體記憶所見證的那座城市。

1. 太平的國土

檢視《灤京雜詠》，可以發現有個詞彙，不斷地被重覆著，那就是「太平」。

蒙古帝王的兩都巡幸是「羽獵山陰射白狼，太平天子狩封疆」；¹²⁹行經兩都往返驛道上的居庸關，感覺到的是「萬里車書來上國，太平弓矢護青山」；¹³⁰進入上京宮城，見到的是「又是宮車入御天，麗姝歌舞太平年」；¹³¹於上京繁華盛宴中，耳聞目見盡是「花冠簇簇停歌舞，獨喜簫韶奏太平」；¹³²而宮廷女眷的活動，也被稱是「寶馬香車金錯節，太平公主幸離宮」。¹³³可以發現，天子是太平天子，公主是太平公主，關隘是太平弓矢，時間是太平年歲，樂音是太平之聲，顯然，《灤京

故曰對角。毛角雖奇，香味稍別，故不升之鼎俎。于以見天朝之玉食，有等差也。」

¹²⁷ 同前註，頁 5 上。

¹²⁸ 同前註，頁 4 下，第八十三首子注。揚州芍藥向來與洛陽牡丹齊名，梅堯臣：〈韓欽聖問西洛牡丹之盛〉，《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311，就將牡丹與芍藥並列，並稱「亦如廣陵多芍藥」。又如陸游：〈錦亭〉，《劍南詩稿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頁 548，「令看廣陵芍藥蜀海棠」，將揚州芍藥與蜀地海棠並稱，可知宋代揚州的芍藥已享盛名。

¹²⁹ 楊允孚：《灤京雜詠》上，頁 1 下。

¹³⁰ 同前註。

¹³¹ 同前註，頁 4 下。

¹³² 同前註，頁 6 上。

¹³³ 楊允孚：《灤京雜詠》下，頁 1 上。

雜詠》刻意將上京安置於太平無事的盛世背景中。

如前所述，楊允孚在元順帝時曾任尚食供奉之官，因而得以隨蒙古帝王遊歷上京，「順帝在位雖長達三十餘年，但在其即位時，元朝亂象已經顯露，以後更是江河日下，不可收拾」，¹³⁴所以即使是在順帝初期，恐怕都不是寧靜穩固的太平盛世，可是通過書寫者建構於回憶的特殊視角，「太平」竟然無處不在。

在這裡，「太平」或許是對照於元末明初的大亂而言，「民眾的起義接二連三，這些起義迅速擴展，成為全國性的社會大爆炸。土匪，宗教信徒，以及其他叛逆者日益狂暴，他們一地又一地佔領城市、搶劫店鋪、殺害官員，向地方上復仇」，¹³⁵楊允孚的好友郭鈺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曾這樣描述動亂中的流離失所：「白髮遺民真可悲，窮途猶望北兵來」、「足繭荒山走風雨，腹飢深夜吼春雷」，¹³⁶北兵不來，江南烽火連年，在這樣的時刻，回望記憶中的上京，時間與距離不斷為記憶補筆，「太平」開始被放大，被虛構，上京因此成為回不去的太平國土。而這些一再一再地重覆的「太平」，或也是書寫者在面對亂世中無止盡的壞毀與人亡時，內心深切的期盼。

2. 美好的樂園

《灤京雜詠》中的上京，還經常被描繪成倉廩盡滿的美好樂園。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認為：「不論何時，只要願意，我們都能隨心所欲地喚起對它的回憶。我們可以從過去當中自由地選擇我們希望沉浸其中的各個時期」，¹³⁷而楊允孚對於上京的追憶，似乎最常沉浸於這種異質空間，樂園的歡樂每每展演於一場又一場的繁華盛宴中，有詐馬筵的「千官萬騎到山椒，箇箇金鞍雉尾高。下馬一齊催入宴，玉闌干外換宮袍」、¹³⁸「錦衣行處俊猊習，詐馬筵前虎豹良。特敕雲和罷管絃，君王有意聽堯綱」；¹³⁹有馬姝子宴的「內宴重開馬湏澆，嚴程有旨

¹³⁴ 蕭啟慶：〈中華福地，古月還家：蒙元興亡與識緯〉，《元朝史新論》，頁90。

¹³⁵ 傅海波、崔瑞德編，史衛民等譯：《劍橋中國遼夏金元史》，頁659。

¹³⁶ 郭鈺：〈乙巳夏五月茶陵永新兵奄至，遂走淦西暑雨涉旬，米薪俱乏，旅途苦甚，因賦詩示諸同行〉，《靜思集》，卷8，頁1223-381，又乙巳年即至正二十五年。

¹³⁷ 莫里哀、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頁88。

¹³⁸ 楊允孚：《灤京雜詠》上，頁5下至頁6上。同頁之第四十二首子注，「每年六月三日詐馬筵，所以喻其盛事也。千官以雉尾飾馬入宴。」

¹³⁹ 同前註，頁6上。

出丹霄。羽林衛士桓桓集，太僕龍車款款調」；¹⁴⁰有金釵宴的「得寵親王馬上回，朱門繡闥一時開。淋漓未了金釵宴，中使傳宣御酒來」，¹⁴¹其他還有「白白氈房撒萬星，名王酣宴惜娉婷」、¹⁴²「承恩留守是何王，錦帳成圍促宴忙」、¹⁴³「侯王甲第五雲堆，秦虢夫人夜宴開」、¹⁴⁴「麗日初明瑞氣開，千官錫宴集蓬萊」。¹⁴⁵此外，楊允孚還不厭精細的以子注描寫宴會的細節，如「詐馬筵開，盛陳奇獸宴享」、¹⁴⁶「每宴教坊美女必花冠錦繡以備供奉」、¹⁴⁷「每即殊禮燕享大會，則設止雨壇于殿隅」¹⁴⁸等。宴享雖被認為是蒙元帝國的「國朝大事」，¹⁴⁹可是如此密集而瑣細的書寫，在元詩中仍屬少見。

而在楊允孚對於宮廷飲食的無盡耽溺與細碎敘述之中，似乎也潛藏著返回樂園的路徑。「嘉魚貢自黑龍江，西域葡萄酒更良。南土至奇誇鳳髓，北陲異品是黃羊」，¹⁵⁰當帝國盛時，宮廷聚集了天下的珍奇異味，來自黑龍江的哈八都魚，運自西域的葡萄美酒，南方所產的鳳髓茶與北地專供御膳所用的黃羊，¹⁵¹在離開之後的回望中，都成為了承載美好記憶的物象。又如「御饌官廚不較餘，金門掌膳意勤如。更分光祿瓶中酒，爛醉歸時月上初」，¹⁵²光祿寺御酒的滋味顯然誘人迷醉，¹⁵³在這味覺記憶之中，展演的是歡樂縱欲的身體與當時的月光。

¹⁴⁰ 楊允孚：《滌京雜詠》下，頁1下至頁2上。頁2上之第六十二首子注，「馬湏，馬妳子也，每年八月開馬妳子宴。」又熊夢祥：《析津志輯佚·風俗》，頁205，「八月，滌京太史涓日吉，於中秋前後灑馬妳子。此節宮庭勝賞，有國制。」

¹⁴¹ 楊允孚：《滌京雜詠》上，頁5上。

¹⁴² 楊允孚：《滌京雜詠》下，頁4下。

¹⁴³ 同前註，頁4上。

¹⁴⁴ 同前註，頁1下。

¹⁴⁵ 楊允孚：《滌京雜詠》上，頁6上。

¹⁴⁶ 同前註，第四十三首子注。

¹⁴⁷ 同前註，第四十四首子注。

¹⁴⁸ 楊允孚：《滌京雜詠》下，頁2下，第六十六首子注。

¹⁴⁹ 王惲：〈大元故關西軍儲大使呂公神道碑銘〉，《全元文》6，頁497，「國朝大事曰征伐，曰蒐狩，曰宴饗，三者而已。」

¹⁵⁰ 楊允孚：《滌京雜詠》上，頁6下。

¹⁵¹ 同前註，第四十七首子注，「黑龍江，即哈八都魚也。鳳髓，茶名。黃羊，北方所產，御膳用。」

¹⁵² 楊允孚：《滌京雜詠》下，頁5上。

¹⁵³ 楊允孚：《滌京雜詠》下，頁5上，第九十首子注，「光祿寺，掌御酒。」

值得注意的是宴享之會與宮廷飲食原就屬於口腹聲色之娛，是一種純粹的感官經驗，Marcel Proust（1871-1922）認為「氣味和滋味會在形銷之後長期存在，即使人亡物毀，久遠的往事了無陳跡，唯獨氣味和滋味雖說更脆弱卻更有生命力；雖說更虛幻卻更經久不散，更忠貞不矢」，¹⁵⁴而這些經久不散的感官經驗，正如同王德威（1954-）在述及《東京夢華錄》時，所言的：「這些官能的震顫也許浮泛得很，但往往成為追憶似水年華的最佳門徑」，¹⁵⁵因為在城市毀滅之後，惟有透過這些感官經驗的瑣碎記憶，以聲色的高潮，以宴飲最酣暢的時刻，重構已經失去的美好樂園。換句話說，楊允孚試圖藉由文字的力量，召喚與重整那些已消逝的，不存在的事物，讓自己彷彿仍置身於歌舞昇平的帝國盛世，沒有戰爭的壞毀，沒有離亂的失序，那是一座被虛擬的美好都城，永遠物阜民豐、歡宴不斷。

由上可知，《灤京雜詠》中的上京，其實重疊著元代上京紀行詩書寫者的集體記憶，通過這個記憶的集體框架，上京被定義為神聖的都城與獵奇的異域，這也是元人在書寫上京時，被複製無數次的詮釋路徑。毫無疑問，楊允孚也呼應了這主流的聲音。但遺民的姿態與書寫的位置，讓他在秩序瓦解的亂世，於恐懼、壞毀之中，試圖通過書寫，召喚那座一再被夢見的城市，¹⁵⁶上京於是被重構成太平的國土與美好的樂園，太平與歡樂在記憶中無限繁衍，遂讓它比真實存在過的上京更為美好。

五、結論

本文以《灤京雜詠》中的上京論述為探討的焦點，關注屬於文學文本的《灤京雜詠》如何觀看與詮釋上京，進而再現了怎樣的一座城市。現將研究成果展示於后：

針對《灤京雜詠》的定位，主要藉由作者楊允孚兩項重要的人生歷程進行確認。其一是他在元王朝的仕宦情形，許多證據都顯示楊允孚確實曾以尙食供奉之

¹⁵⁴ 普魯斯特著，李恒基、徐繼曾譯：《追憶似水年華 1》（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2 年），頁 53。

¹⁵⁵ 王德威：〈北京夢華錄：北京人到臺灣〉，《如此繁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頁 43。

¹⁵⁶ 楊允孚曾在詩中提及自己不斷夢見上京，如《灤京雜詠》下，頁 7 上，「帝里風光入夢頻，鳳城金闕一般春。故鄉不是無秋雨，聽過匡廬始愴神。」

職，隨蒙古帝王遊歷上京，並且親歷目睹這座草原都城的繁華盛景與上京宮苑的華奢尊貴，這使得《灤京雜詠》中的上京書寫因而具有紀實的基礎。其次是楊允孚在元明易代之際，刻意選擇了隱居不仕的「遺民」身分，將自己定位為舊朝前臣。而當他以這種身分，懷著對於前朝深厚的情感，一首詩接著一首詩，書寫這座已經毀滅的城市曾經的繁華，這種幾近永恆的回望與離開者的觀看視角，將讓他在描述上京時，始終看到的都是美好的過往。

至於由空間書寫次序的角度來看《灤京雜詠》，則是期望通過楊允孚對於空間意義之判斷來展示其上京書寫的本質。將《灤京雜詠》中出現的城市地景，依序排列，分別是宮城中心的大安閣、水晶殿，然後是皇城之外的樸毛殿，再從宮城周邊到皇城剪影，可以發現其中的次序不是依照實際的地理方位，而是取決於「中心」的文化概念。所以作為帝王議政與舉行有關國家體制儀典的大安閣與水晶殿，就以其重要的政治寓意，居中心的重心。而作為蒙古儀典施行場所的樸毛殿，亦位居中心的位置，重要性僅次於大安閣。然後由中心至外部，隨重要性向外擴散，依序是帝王所居的宮城與宮城之外的皇城。透過這種空間敘述的先後次序與內容的輕重取捨，可以發現《灤京雜詠》中的上京，本質上是屬於帝王的上京，而非庶民階層的上京，所以其敘述的重心多集中於蒙古帝王與貴族的宮廷生活。

對於《灤京雜詠》的上京書寫，本文將其定義為一種「兵燹所過，莽為丘墟」的回望，也就是說，楊允孚所書寫的上京是被封存在過去的時空裡，一座再也回不去的記憶之城。以書寫對抗時間之流中的遺忘，似乎是《灤京雜詠》寫作的起點，憑藉記憶，楊允孚以文字復現已經永遠壞毀消逝的上京城。這種重構，主要以雙軌交織著兩重的聲音，一是曾親歷其地者集體之記憶；一是作者個人的私密記憶。

所謂的集體之記憶，指的是一種位居時代主流的集體聲音與共同想像，而這種集體記憶中的上京，最常表現為神聖的都城與獵奇的異域。因為上京原就是蒙元帝國的草原之都，都城的位置使其被視為王權的象徵，作為帝王所駐的王城，「神聖性」因而成為上京獨特的場所精神。《灤京雜詠》對於上京「神聖性」的建構，主要是利用上京建城的神話傳說，賦予其神聖化的存在價值，通過這種詮釋，上京不但成為龍興之聖域，在與中國流行的天命學說結合之後，更鞏固了元王朝作為正統王朝的合理性。除此之外，《灤京雜詠》亦常通過帝都的仙境化來展示上京的「神聖性」，這種刻意將上京與蓬萊加以連結，形成固定的比喻關係的作法，更強化其神聖都城的意義。至於被視為獵奇的異域，則是源於上京與其所在的蒙古

大草原，在漢族王朝時期，始終都是國土地圖之外，遙遠、神秘與野蠻的異域，但在元代，上京被收納於帝國的內部，那曾經被未知覆蓋、難以理解的世界，開始有了進入的路徑，在這迢遙的旅程中，旅行者雖未跨越帝國疆界，卻沉浸於異國情調，不只《灤京雜詠》，這種獵奇之眼的凝視，幾乎是所有上京紀行詩中最重要的主題。《灤京雜詠》所組構的異域圖景，多緣於感官知覺，如超出想像的寒涼氣候與上京的種種奇食異味，這些與認識經驗歧異之例證，不但被《灤京雜詠》記下，並且不厭其煩的標注，藉此投影出異域之奇。

如果說集體記憶所形構的是眾人所共同見證的那座城市，相對而言，私密記憶所回溯的就是附著作者個人記憶的想像之城，個人記憶的私密性與獨特性，將賦予這座城市獨一無二的性格。例如《灤京雜詠》常將上京放置在太平無事的盛世背景中，天子是太平天子，公主是太平公主，關隘是太平弓矢，時間是太平年歲，樂音是太平之聲，上京自是永恆的太平國土。但就元代實際的政治情勢而言，即使是在順帝初期，恐怕都不是寧靜穩固的太平盛世，可是通過書寫者建構於回憶的特殊視角，「太平」竟然無處不在。本文認為這裡的「太平」或許是對照於元末明初的大亂而言，在江南連年的烽火中，楊允孚回望記憶中的上京，時間與距離不斷為記憶補筆，「太平」開始被放大，被虛構，上京因此成為永恆的太平國土。而這些一再一再地重覆的「太平」，或也是書寫者在面對亂世中無止盡的壞毀與人亡時，內心深切的期盼。此外，倉廩盡滿的美好樂園也是楊允孚在重構上京時，最常選擇的異質空間，那一場又一場的繁華盛宴，那來自帝國各處的奇珍異味，以各種形式展示樂園的歡樂。楊允孚似乎想藉由文字的力量，召喚與重整那些已經消逝的，不存在的事物，讓自己彷彿仍置身於歌舞昇平的帝國盛世，沒有戰爭的壞毀，沒有離亂的失序，那是一座被虛擬的美好都城，永遠物阜民豐、歡宴不斷。正是這種被放大的太平與歡樂，讓《灤京雜詠》中的上京成為一座虛構之城，不管城市在現實世界中如何地枯朽壞毀，只要透過書寫，消失的美好樂園就會重新打開，被夷平的盛世都城也會自廢墟中漸漸還原，而且永遠比真實存在過的那座城更繁華美好。

引用文獻

一、專著

(一)

- 唐·杜甫：《杜詩鏡銓》，臺北：華正書局，2000年。
- 元·孔齊：《至正直記》，《粵雅堂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
- 元·危素：《危太樸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7，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 元·李穀：《稼亭先生文集》，《韓國歷代文集叢書》14，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年。
- 元·周伯琦：《近光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
- 元·柳貫撰，柳遵傑校點：《柳貫詩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
- 元·胡助：《純白齋類稿》，《叢書集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
- 元·納新：《金臺集》，《四庫全書薈要》，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
-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叢書集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
- 元·馬祖常：《石田文集》，《四庫全書薈要》，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
- 元·許有壬：《至正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7，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元·郭鈺：《靜思集》，《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 元·傅若金：《傅與礪詩文集》，《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 元·黃潛：《黃文獻公集》，《叢書集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
- 元·楊允孚：《澹京雜詠》，《知不足齋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
- 元·虞集：《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
- 元·賈銘：《飲食須知》，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年。
- 元·熊夢祥：《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
- 元·薩都刺：《雁門集》，《四庫全書薈要》，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
- 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元代珍本文集彙刊》11-12，臺北：中央圖書館，1970年。
- 明·宋濂等著：《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明·金幼孜：《文靖集》，《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明·楊士奇：《東里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_____：《東里續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_____等編：《文淵閣書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年。

明·蕭洵：《故宮遺錄》，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

清·顧嗣立編：《元詩選·初集》上中下，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李修生等編：《全元文》6，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_____：《全元文》24，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

（二）

尹國均：《符號帝國》，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年。

王德威：《如此繁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

史衛民：《元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周良霄、顧菊英：《元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唐曉峰：《從混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論》，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陳高華、史衛民：《元上都》，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

_____：《元代大都上都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傅海波、崔瑞德編，史衛民等譯：《劍橋中國遼夏金元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楊鐮：《元代文學編年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

_____：《元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鄧紹基編：《元代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蕭啟慶：《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

_____：《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年。

_____：《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_____：《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9年。

魏堅：《元上都》，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年。

宇文所安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

Halbwachs, M. 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Italo Calvino 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臺北：時報出版社，1993 年。

Jorge Luis Borges 著，王永年譯：《小徑分岔的花園》，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 年。

Marcel Proust 著，李恒基、徐繼曾譯：《追憶似水年華 1》，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2 年。

Marco Polo 著，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Mike Crang 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出版社，2003 年。

Susanne K. Langer 著，劉大基等譯：《情感與形式》，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1 年。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公司，2006 年。

二、論文

史鐵民：〈再論楊允孚的《瀟京雜詠》〉，《株洲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4 期，2006 年 8 月。

史鐵良：〈元末詩人楊允孚及其《瀟京雜詠》〉，《古籍研究·2005 卷下》，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 年。

石田干之助著，包國慶譯：〈關於元上都〉，《元上都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 年。

李嘉瑜：〈上京紀行詩的「邊塞」書寫——以長城、居庸關為論述主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14 期，2008 年 7 月。

_____：〈不在場的空間——上京紀行詩中的江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18 期，2010 年 7 月。

邱江寧：〈元代上京紀行詩論〉，《文學評論》第 2 期，2011 年 2 月。

高莉芬：〈蓬萊神話的海洋思維及其宇宙觀〉，《政大中文學報》第 6 期，2006 年 12 月，

陸思賢：〈關於元上都宮城北牆中段的闕式建築基台〉，《元上都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 年。

董廬：〈元上都略考〉，《元上都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 年。

韓儒林：〈元代詐馬宴新探〉，《元上都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 年。

Memory City and Fictional City—— Shangdu Writings of *Luanjing Zayong*

Lee, Chia-yu^{*}

[Abstract]

Shangdu travelling poetry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continuously appearing in the Yuan poetry. Although *Luanjing Zayong* classified as a Shangdu travelling poetry, which described wonders and unique of the exotic land, the writing technique is not as usual as recording in place. It is a few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travelling, restructure the vanish city from the memories

This thesis will discuss what scenes and people affairs were chosen from *Luanjing Zayong*. It will also discuss, by using those memory fragments, what kind of Shangdu city reconstruct from *Luanjing Zayong*. Compare to other Shangdu poetry writings using recording in place, will some of the details been forgotten from this special "Memories" recording technique of *Luanjing Zayong*? Is there any kind of changes caused from these forgotten details? It is believed, from those discussions above, the current theme subjects would be able to advance in Shangdu travelling poetry at another level.

Keywords: the Yuan poetry, Shangdu traveling poetry, Luanjing zayong, Spatial writing, Cultural Geography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